



扎根 ■种楠

## 生活故事

## 女儿发我压岁钱

■费平文

“爸爸,给你的……”当除夕夜24岁的女儿拿着一只红包送到我手上时,我一阵莫名,随即感悟过来是女儿给我发压岁钱了!顿时,既惊讶又感动,欣喜中五味杂陈……

24年了!自女儿出生至今,我们每年过年都要给她压岁钱。记得第一次给女儿压岁钱是在她一周岁那年,妻子用云片糕的红纸包了崭新的一张10元钱,放在她枕头下,一来当时红纸袋不大好买,二来包云片糕的红纸寓意层层高升,希望女儿快快成长。

以后每年的压岁钱就这样随着女儿渐渐长大而节节增多,从20元、50元、100元、300元一直到她读大学时的500元和初工作后的1000元……这些压岁钱的用途也因年龄而异,上幼儿园时给她买玩具;上小学时买学习用品;中学时作春游费用;大学时补贴伙食;工作后,女儿将压岁钱积攒起来,有时用来买衣物化妆品,有时作为周游旅游费。

今年春节前,我和妻子早已提前准备了新版100元人民币50张放入红包,打算在吃过年夜饭后给女儿作压岁钱。不料她却领先一步,先后给了爸妈各两只红袋袋的压岁钱,里面

各放了1800元新钞。

女儿给我们压岁钱,说明我们老了。一辈子辛勤工作,退休后尽管有养老金,但生活的压力、看病的支出、正常的应酬,加上传统的勤俭观念,让我们精细划算着每一个铜板的用途。以致女儿在给压岁钱的同时,特地叮嘱:你们别留着、存着哟,要花掉,买自己喜欢吃的、穿的,或外出旅游去!——听了女儿的叮嘱,我们感觉真的老了。

拿着女儿给的压岁钱,我和妻子是感动的。我们小时候每年在长一岁,也是由大人发压岁钱。虽然那时生活条件艰苦,父母给的都是一毛、两毛钱,然这给与拿的过程中,体现的是亲情,是中国数千年长辈祈求子孙平安幸福的仪式。如今女儿给我们压岁钱,是生命的轮回,感恩的回报。

## 意犹未尽

## 双璧

■赵韩德文

春节出门闲走走,买了一本书,很喜欢:一个浙江人写的小说,另一个浙江人为之插图;是同代的大文人、大画家,最后又都在民国文化风韵最浓的上海落脚。把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浙江绍兴风味,流露得浓郁郁郁。这本书的书名是《丰子恺插图·鲁迅小说全集》,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心谓之“双璧”。

书,是在虹口公园的“鲁迅纪念馆”内购得的。——散步到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自然不可不去。

春节,鲁迅先生并不寂寞,纪念馆内游人三三五五陆续续续安安静静。公园洁净美丽,高大的水杉、云松、梧桐等乔木挺拔入云,神采爽朗,玉兰树浓绿鲜明如膏沐,草坪保护得很好,虽然浅黄,但是厚实如毯。人们有放风筝的,有闲步的,有荡舟的,也有激情卡拉欧凯、跳舞的,平和自在。

记得读中学时,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对鲁迅的评价与当时的教辅材料颇有点不同,只是四个字:“彼岸。博大。”

很巧,语文老师也是浙江绍兴人。上语文课到《社戏》、《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黑板前的绍兴老师沉醉在对故乡的回忆里。他用绍兴官话缓缓地讲乌篷船,讲周家临水的台阶、黑漆的大门、高高的门槛;讲曲曲折折的河;讲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讲何首乌和木莲,讲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讲三味书屋里那张鲁迅刻过“早”字的课桌……

我们听得迷迷醉醉。长大后我特意到绍兴去,在少年鲁迅的塾师用尺子打学生手掌的小课堂上,站了许久许久。

纪念馆我以前也曾来过,发现经过精心修缮,现在的纪念馆不仅原汁原味,也非常的现代,非常的大气。感觉好极了。

纪念馆的底楼大厅,是纪念品销售台。琳琅满目最显眼的,是仿真鲁迅书法。先生的书法在中国近代书坛独树一帜,古朴典雅。一支普通羊毫小楷,一锭普通“金不换”墨,鲁迅先生伏案用它们写出了数百万字的文书自得,常常写了毛笔字惠赠朋友。最著名的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先生的字体之形成,得力于涉猎和勤抄古碑帖。

鲁迅先生当初到北京——这时他的第一篇《狂人日记》还渺无踪影——住在绍兴会馆内百无聊赖,又暂无工作,于是就坐在会馆的大槐树下研究、抄录旧碑帖。抄得忘情。大槐树上的虫屎掉在脖子上,一凉,才发现抄了许久。后人、专家们经过研究,说鲁迅体的书法基因,大致就形成于此时。

而《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就是在这个时候来的,他前来自周家兄弟(树人、作人)约稿,做了不少动员工作,每每在会馆里聊到深夜。钱玄同也是浙人(浙江吴兴),是周树人师从章太炎时的同窗好友。周树人(鲁迅)在钱编辑这位说客的劝导下,半个月后终于交稿——处女作《狂人日记》。陈独秀、钱玄同主编的《新青年》立即予以发表。一时狂飙突起,震撼了整个文学界和思想界。我想,真悬,如果没有钱玄同这个说客这个伯乐这个有心人,周树人先生可能就不是鲁迅了,就可能一直抄抄旧碑帖考考古了。中国就会多了一个冬烘先生;《狂人日记》就没有了,现代文化史完全是另一种写法了。

蛮有味道的看完先生书法,旁边的书架又让我眼睛一亮:竟同时看到了两个名字——“丰子恺、鲁迅”。连忙把书捧在手中,稍一翻阅,世纪初的越地鲁镇风情,丰先生的简笔漫画夹着熟悉的文字,飘然涌入眼中:鲁镇小酒店,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坐在门槛上吸烟的七斤,冷风里的乌篷船,“豆腐西施”杨二嫂,“真能做”的阿Q,阿Q偷萝卜的“静修庵”,种田打鱼的平桥村,月色下的社戏,聚在船上煮罗汉豆的孩童,六一公公掉着小船归来,搬桌子扫地的祥林嫂……

丰子恺世情漫画里的童心、温良、平和、慈悲、博爱,直到今天,许多书刊杂志还时时取用。如果说,著名民俗民画画家贺友直先生笔下的市民社会带有贺老自谦的“手艺人”气息的话,那么,窃以为,丰先生漫画的民生活,则是以文人风襟来表现的。

把书买好,放在包里,回头看看,依依离去。展厅壁上,是臧克家那首著名的纪念鲁迅的诗——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 杨浦人文

##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十四)

■管新生文

2

接下来,便开始了杂乱无章投五投六像没头苍蝇似地一番忙乱。

我们去了保定路舟山路的木柴商店,其实已经不是商店店铺,而成了一条街,人山人海。大家排着队凭结婚证证明加户口簿购买打家具用的木头三夹板纤维板。记得文革以前此处是保定路棺材铺,印象中我还在店门口看过那些一排排没来得及上漆的黄澄澄本色的木坯子棺材,那时年少,有些吓唬,没敢迈进门去。文革一开始,破四旧立新,棺材铺在劫难逃,当在被砸之列,便改为了木柴商店,之后生意兴隆,便扩展到马路上了。记得那一天,父亲也兴致勃勃地赶去了,说是给我们当参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当年时兴的是“36只脚”——卧床、大衣

柜、五斗橱、床头柜、四方台和四把椅子的脚统加在一起的总数;“四大件”——要名牌的: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三五牌台钟。购置齐全,就像现在有房有车了,结婚的硬件才算搞定。“四大件”理所当然地全部凭票供应。

上海牌手表1955年开始试制,1958年3月正式投产,7月上市。每只售价60元。第一批试销100只,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顾客办理登记预售,一个上午办理登记的就超过1000人。投产当年(1958年),上海手表厂共生产A581型上海牌手表13600只,为周恩来总理引以为豪的“国产表”。后来生产的上海牌17钻全钢男式防震手表每只120元,半钢80元。

凤凰牌自行车的价格在160元左右,与收入相比,绝对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所以,大部分骑车人爱护自行车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每天会耗

上一个多小时揩车,还有不少人自我规定下雨下雪天不踏——心疼啊!

生产蝴蝶牌缝纫机的协昌缝纫机厂始建于1919年,由民族资本家沈玉山创建。“蝴蝶牌”缝纫机的豪奢,不仅在于其134元的昂贵价格,还在于凭票供应的紧张程度:由上海百货公司印制的“缝纫机购买券”在各系统、各区县企事业单位内部分配,上海平均每年每80个人发一张,其他城市以收取相当数量的“工业购货券”购取。

三五牌台钟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上足一次发条,台钟就可以走上十五天,三五牌因此而得名。它独特精巧的设计在于采用全铜机芯,钟摆使用螺杆装置,通过调节螺杆的长度来控制走时的速度。造型古朴典雅,放在五斗橱上,既是计时工具,又是装饰品工艺品。现在,也有人出高价收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生产厂家与上海铝材厂均隶属同一工业局:

上海轻工业局。上海手表厂中国钟厂的表面钟面均为我厂提供的板材。

依稀记得,缝纫机票是女友单位班组里让给她的,手表票好像来自姜丕基,三五牌台钟票是丈人阿爸给的。自行车票,记不清了,只知道自行车三厂《凤凰报》编辑叶培本给过我一张18寸男式自行车票的,不过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了。

说来有趣,而今自行车早已不知去向,停摆的上海牌手表深藏柜子里不见天日,缝纫机跛了一只脚靠边歇着去了,唯有三五牌台钟依然很威武地在哒哒哒走动。不仅如此,发票犹存,购买店是上海南京东路132号友联钟表商店,日期为1977年3月12日,同时还有一张出品单位上海中国钟厂的使用说明书,上书两行字:钟能歪斜走,针可倒顺拨。

在没有广告语的当年,这朴实无华的十个字是不是很牛?真可谓奇妙无比!

“36只脚”“四大件”的置办虽然很难,但还不算顶顶难,难上加难的极品,完全和今天一个样——房子是婚姻的必需品,结婚必须要有房子啊!

是啊是啊,有房才有家。关键的

问题是,房子从哪儿来?

这才是最根本最要命的棘手活。《列宁在十月》电影中,瓦西里对妻子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但他没有具体说到房子也会有的。而当年,我们国家的房子是福利型分配的,极少数的私房是买卖的。物资匮乏的年代,最缺少的物资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房子。而“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房很少,更是雪上加霜。君不见,三代同室四代同屋屡见不鲜,不少人家床铺向空中发展发展再发展,把大好头颅放进桌底、双脚伸进床肚睡觉更不是天方夜谭的稀罕物事。文革刚兴起的那一阶段,上海滩先后掀起了三次抢房风潮,甚至出现了“上海市困难户造反队”之类的组织。是啊,准样板戏《杜鹃山》中的乌豆(后更名为雷刚)满世界找不到引路人共产党,不是吼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吗:抢!找不到共产党,就抢一个共产党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既然没房子,当然也可以抢一幢房子来!此乃戏话,其实当时的《杜鹃山》还未拍摄成电影全国放映,而是一场没来得及升级的小小的话剧而已。